

一代师表，德学双馨

——记中国科学院王文采院士

艾铁民

(北京大学药学院, 北京 100191)

今年 6 月 5 号是中国科学院王文采院士的九十寿辰。我 1981 年作为诚静容教授的首位研究生进行了毕业答辩, 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研究员, 从那时起, 我和王文采先生已经相识 35 年了, 在我一生为人和治学方面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同仁专家的教诲和帮助,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为两位, 一位是我的导师北京大学药学院诚静容教授, 另一位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先生。



图 1 王文采院士在研究工作中

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 在国际学术界也影响巨大。他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荣获 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植物志》荣获 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是我国毛茛科, 苦苣苔科, 紫草科, 荨麻科的专家, 在研究中, 发表 20 个新属, 约 600 个新种; 修订了毛茛科, 翠雀属, 唐松草属铁线莲属等多个属的分类系统并揭示了苦苣苔科的演化趋势; 根据对多科植物的分析研究, 发现东亚植物区系 3 个迁移路线, 16 个间断分布式样, 从而推出了我国云贵高原和四川是被子植物在赤道地区起源后, 向北扩展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心(图 1)。据国家标本馆不完全统计, 王文采先生采集标本数量 9 000 余份, 足迹遍布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 20 个省市自治区; 鉴定标本超过 35 000 份, 涉及 114 科, 566 个属和 2 100 多个种, 是国家标本馆鉴定标本数

量最多的专家之一; 1990 年应邀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做短期研究工作, 为国家标本馆带回了 H·史密斯博士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间在中国四川、云南、山西等地采集的副份标本 3 400 多份, 其中包含很多模式标本, 这些标本回归, 为我国分类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就王文采先生的学术成就对药用植物及植物药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贡献做重点介绍, 并对王先生感人的优秀品格也做些介绍。

1 大搞中草药运动和第三次全国中草药普查

1965 年初, 即《中国植物志》面世 40 年前, 中国没有一套完整和系统的植物鉴定工具书, 为了解决全国植物鉴定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决定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书, 成立编写组, 由王文采先生负责。编写工作进展很快, 至 1966 年 5 月, 仅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完成了一册半的稿子, 但当该书第一册付梓印刷时,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 编写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运动中, “赤脚医生”和中草药被重视, 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 各省、市、地、县纷纷编辑中草药手册, 而采集大量的标本需要鉴定, 有许多标本定不了名, 源源不断的寄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请协助鉴定。1970 年, 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工作又引起该所重视, 重新启动编写工作, 仍由王文采先生主持。1972 年完成《图鉴》前两册, 经广泛征求全国的意见认为原来计划编写 4 册内包含的种太少, 改为 5 册。对于前 2 册没有包含的种类则采取补编的方式, 全书共 7 册, 1 057 万字, 在 1972-1983 年陆续出版(图 2)。书中记载我国有经济和药用价值的绝大多数种, 近 11 000 种。这中间王文采先生参与了荨麻

科,毛茛科,苦苣苔科等 10 余科的编写,鉴定了大量标本,其中许多是药用植物标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是简要的“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于 2004 年全部出版前中国高等植物鉴定的最重要和权威的工具书,获得 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名至所归的。



图 2 王文采院士主持完成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图 3 1983 年王文采院士(前排中)参加中国中药资源丛书编委会的会议



图 4 王文采院士审定的《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从 1983 年开始进行第三次全国中草药资源普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通过这次普查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标本,摸清了中国中草药资源的基本家底。中国药材公司(全国中草药普查办公室)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在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中国中药资源丛书共 6 本,其中《中国中药资源志要》记载了我国药用资源 12 694 种,其中药用植物 383

科,2 323 属,11 020 种;药用动物 414 科,879 属,1 590 种,药用矿物 84 种。在药用植物鉴定方面王文采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药材资源地图集》主要的审定人,并于 1994 年 11 月 15 日的鉴定会上任主任(图 3,图 4)。

2 提携之恩,铭记于心

我的导师诚静容教授,生于 1913 年,年长王文采先生 13 岁,但他们互相敬重,是好朋友。1990 年诚先生退休后常去美国看女儿,同时到哈佛大学标本馆看标本,指导未毕业的研究生做课题。那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工作,由于诚先生常在国外,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我就请教王文采先生,得到王先生的谆谆教诲。他那时刚退休,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聘请去帮助鉴定标本,此外我课题有些标本鉴定有问题,王先生也予以无私的指导。

1995 年,我又回北医,由于担任系室领导工作和指导研究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更为广泛,遇到学术问题就向王先生请教,我们间的来往和书信也越来越频繁,我深深地感到他学识的渊博和对后学无私提携之情。

2001 年北京大学药学院实施新学制,招收长学制的学生,采取本硕融通的培养模式。为了配合长学制教学,编写本科选学、研究生必学药用植物学教材也就极为迫切,由于那时国内还没有植物分类学的硕士研究生统一的教材,既没有教材可借鉴,也没有经验可遵循,为了高起点、高标准地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编写初期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院士,洪德元院士,路安民研究员,本校诚静容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谢宗万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杨春澍教授座谈,他们都为这本教材编写提出了宝贵意见,其中王文采院士就采用被子植物 cronquist 系统,纳入教材的科目和科数都提出指导性意见,就植物学名如何正确应用印刷字体以区分正名和异名,提出一定要与世界著名植物志接轨的意见。这本教材出版之后,获得了同行专家的好评,至今还被列为一些高校相关专业考博的指定参考书。

2005 年初国家筹划成立国家出版基金委,2006 年我们投标的《中国药用植物志》首批中标,列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该志是一本包括 13 卷,2 800 多万字,11 000 多幅墨线图,6 000 多帧彩色照片的巨著。对中医药科研、教学、临床、生产、营销、国际贸易和药政管理人员来说是重要借鉴的参考工具书。在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心下,资金于2008年到位,当年成立编委会并启动工程,王文采先生被聘为编委会主任,至那时起,王文采先生不顾80岁的高龄,多次参加编委会和编写研讨会,多次来函指导,并赠送给我Heywood的《Flowering Plant of the World》的原版书做参考,全心全意地指导和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学术问题,对提高《中国药用植物志》的学术水平和质量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前全书已完稿,并出版了6卷,争取2016年末至2017年初全部出齐。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感到疲倦时,一想到王文采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就充满继续向前的正能量。我认为,王文采先生对我的支持已超出了个人之间友谊的范围,他是以实际行动在对我们的药用植物和中草药事业予以实际支持。

3 崇高的品德,为人师表

王文采先生生于1926年6月5日,是山东省掖县人,父亲是生意人,在文采先生2岁半的时候就过世了,此后家境变得困难。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苦痛,但母亲教子有方,坚持供文采先生读书。文采先生小学毕业于北京厂桥小学,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1949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在中学时他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题词:“以媚字奉亲,以苟字省费,以聋字止谤,以吝字防口,以贪字读书,以疑字穷理,以刻字责己,以狠字立志,以悔字改过”。王先生一身都遵循了这些做人做学问的厚德信条。

文采先生非常孝敬母亲,尤其是1956年他母亲患病,他请保姆护理,请医生治疗,经济上捉襟见肘,他就卖书,须知书是卖时便宜买时贵,有的书尽管他很喜欢和有用,但为了给母亲治病,也忍痛割爱。

1961年肖培根先生(现为工程院院士)29岁,为了完成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任务,单位领导派他到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进修两年,进修课题的负责人就是王文采先生。这两年肖培根先生自己称之为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在王文采先生的引导下他发现了新属1个,新种7个,新变种2个,新组合13个,发表论文5篇,这些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

关注。

文采先生发现数百个新种,20个新属,有些引起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做了合并处理,对此王先生不但不生气,还表示支持。他说,一个类群植物研究的人越多,研究结果越多,就越可能接近客观。即使王先生对某些研究成果并不同意,也不多加评论,这对于学术大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王先生的宽广胸怀。

文采先生的秘书孙英宝与王先生10多年交往中时刻被王先生的大师风范和谦卑上进的心态所影响和激励。王先生虽然在植物分类学界屈指可数,但他从来没有摆大腕的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学者向他请教都会得到他真诚和热心的指导和帮助。王先生对身边工作人员在生活上也体贴入微,孙英宝说王先生对他们一家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外,每逢节日临近,王先生都会买一些好吃的东西送给他家,尤其对他女儿比较喜欢和关注,经常送给她一些零食和书籍,还经常对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文采先生不仅术业有专攻,还善于书法与字画,以其修身养性并启发教育他人。1992年春节到我家做客,席间我谈到药用植物和生药学工作之艰难辛苦。没多久我就收到王先生赠给我的一幅字画,画为王先生亲手所绘,引唐朝诗人贾岛的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并对我说,采药的意境多美啊!文采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以艺术作品来帮助我树立不畏艰苦、热爱专业的精神。这幅画已成为我永远的珍藏之宝。

《中国药用植物志》已出版6卷,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赠书有限。我们没有赠书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王先生就把赠给他的那套书的每卷都赠给了该所图书馆。令人称道的是,他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中国药用植物志编委会的名义签字赠书。其不图名利的无私举动真是令人钦佩至极。

山东省莱州市政协文史委员梁方文对王文采先生的印象是为人“大道”,为师“有品”,我对王文采先生的赞词为:“一代师表,德学双馨”。



艾铁民,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和植物药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中国中药协会顾问,《中国药用植物志》主编。